

大城市内部服务业区位研究进展

周 麟, 沈体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随着服务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服务业正在成为不同大洲和国家大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而不同规模、类型服务业的区位选择也被视为塑造大城市内部经济结构的主要驱动因子。基于此,本文从空间分布格局、区位选择偏好、主要影响因素等3个方面对国外大城市内部服务业区位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主要结论包含:①集聚与扩散的解读是区位研究的核心。②交通要素在集聚与扩散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③研究视角趋向微观化。④强调地方政策、人居环境等非经济要素对于服务业的影响。⑤开始关注社会公平。最后,本文针对中国大城市内部服务业区位研究与实践提出:应加强基于企业个体数据的演化规律探讨,推动地理空间分析的社会经济转向以及有机嵌入城市规划与管理体系。

关键词:大城市内部;服务业区位;研究进展;国外文献

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服务外包的兴起、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以及信息技术革命等一系列创新机制,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经济迅速发展(Jansson, 2013)。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各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均值,自2009年起便稳定在70%以上,远超60%的服务经济标准线,标志着服务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考虑到城市空间结构作为社会经济要素的地理投影(陆大道, 1995),服务业的区位选择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不仅长期影响职住平衡、土地资源分配等实际问题,同时也是地理学、城乡规划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议题。相比而言,中国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关键期,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0.5%,虽然距世界平均水平仍有差距,但无论是增加值还是占GDP比重均连续3年超过工业,可以预见,服务业正在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

强大引擎,也将直接影响城市功能与结构的和谐共生(申玉铭等, 2015)。在此基础上,本文置身于世界坐标系,对国外文献中的服务业区位研究进行述评,并基于文献检索与分析提出“空间分布格局—区位选择偏好—主要影响因素”的综述框架,为国内学者研究提供借鉴,也为中国服务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存量优化提供启示。

服务业包罗万象、错综复杂,区位研究的差异性十分明显。因此,本文提出如下两点限定:①选取重点研究的服务业类型。综合考虑篇幅限制与服务对象、性质及评价标准,本文主要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自主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业视为综述对象,未包含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等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社会性服务机构,并参考国外普遍接受的辛格曼服务业四分法与国内《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城乡规划用地分类标准》等对服务业类型的界定,将2011年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8类行业划入研究范围,分为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

收稿日期:2015-09;修订日期:2016-0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300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166);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JL061)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71473008;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13&ZD166; Youth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15CJL061].

作者简介:周麟(1988-),男,河北保定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空间结构、服务业区位研究,E-mail: zhoulunup@pku.edu.cn。

通讯作者:沈体雁(1971-),男,湖北天门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区域经济分析等方面研究,
E-mail: tyshen@pku.edu.cn。

引用格式:周麟, 沈体雁. 2016. 大城市内部服务业区位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35(4): 409-419. [Zhou L, Shen T Y. 2016. Progress of services location studies in metropoli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4): 409-419.]. DOI: 10.18306/dlkxjz.2016.04.002

进行综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类),金融业(J类),房地产业(K类),租赁和商务服务业(L类),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M类)等提供中间产品或服务的行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F类),住宿和餐饮业(H类),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O类)等直接向居民提供消费品或服务的行业则纳入生活性服务业范畴。②综述将聚焦于大城市内部。随着服务经济时代的来临,不同大洲和国家的大城市均出现从物质产品生产中心向科技、文化与服务中心转变的趋势,产业结构趋向软性化(石忆邵等, 2012)。同时,服务业所特有的产品无形性、个人消费性等属性决定了城市内部是其天然的滋生地(申玉铭等, 2009)。可以说,服务经济已成为大城市内部共同的经济形态与发展引擎,有必要对其区位研究进行系统综述。

2 空间分布格局

空间分布格局的相关文献旨在客观地描述大城市内部的服务业受空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位置状态与布局规律,主要议题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郊区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模式。随着郊区化现象的越发普遍,服务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到广泛关注,多中心、单中心还是分散化的集聚与扩散模式成为学者长期探讨的内容。二是交通基础设施引导下的空间经济现象。机场、轨道交通站点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不仅可改变经济要素的流向,也在诸多大城市诱发了服务业的迁移与集聚,这种空间经济现象吸引了众多学者从事研究。

2.1 郊区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模式

2.1.1 生产性服务业

郊区化动力机制的不同导致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地域性差异。其中,欧美学界的研究展现了多中心模式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并详细描述了CBD、次中心与有序蔓延之间的互动联系(Coffey et al, 2002; Hermelin, 2007; Sokol et al, 2008)。Boiteux-Orain等(2004)、Arauzo-Carod(2015)认为,1978-2011年间巴黎的生产性服务业布局呈现典型的多中心模式,CBD始终是经济活动的核心区域,多个郊区次中心的集聚程度则不断增强,且出现业态专门化趋势。Leslie等对菲尼克斯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并认为多中心模式的形成源于大

型企业在CBD的持续集聚和不同类型企业差异化的有序蔓延机制(Leslie et al, 2006; Leslie, 2010)。Drennan等(2011)指出,美国49个大城市均存在多中心模式,并进一步将其按照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分为4个层级,仅第一层级城市的CBD没有发生规模经济的扩散,其他城市的CBD虽然具备首位优势,但发展速度均滞后于主要次中心。与此同时,受到人口郊区化与新城新区建设等影响,亚洲大城市的多中心模式也趋向常态,但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机制:北京、上海、东京的生产性服务业均在CBD和次中心持续集聚,且主次中心呈现分工协作特征(Sassen, 2001; Han et al, 2009; Pan et al, 2015),而在对首尔、广州的研究中,康南(Kangnan)新城与珠江新城作为政府主导的新城,发展初期便迅速崛起,大量企业的持续进驻使其在近年来逐渐取代原本的CBD,这种CBD的漂移彰显了政策引导在亚洲城市的重要性(Yi et al, 2011; Kim et al, 2014)。

与上述研究结论不同,大洋洲与拉丁美洲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以单中心模式为主。Watkins(2009)指出,1971-2006年间墨尔本的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聚在CBD,且出现业态专门化特征;与巴黎、东京等城市不同,郊区企业总体呈现分散分布的布局模式,并未形成次中心,悉尼、布里斯班等城市也存在类似现象(Freestone et al, 1998; Trendle, 2003)。拉丁美洲的城市蔓延主要源于新移民迁入及保障性住房的郊区化政策,因而较难形成成熟的多中心模式(Suárez et al, 2009)。例如, Suáñez等(2009)指出,墨西哥城的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在CBD,并出现沿交通干道向外线性扩散的趋势。Fernández-Maldonado等(2014)基于就业密度与企业密度双重门槛,认为墨西哥城、利马以及福塔莱萨等大城市已具备多中心分布的雏形,但潜在次中心受到通勤成本与功能分区的影响,均毗邻CBD出现,因而仍可视作单中心模式,只是中心范围在不断扩大。

2.1.2 生活性服务业

与生产性服务业不同,生活性服务业的郊区化、分散化已成为学界共识。Robertson(1983)、Wasmer(2002)认为,1954-1997年间,随着CBD的营业额大幅下降,美国主要城市的零售业均出现向郊区扩散的特征。Lee等(2006)进一步对1980-1990年间12个大城市的批发零售业进行分析,除休斯顿以

外,其他城市郊区的从业人员比重均超过60%,部分城市甚至达到80%,且年均增幅均非常显著。个案研究中,Dong(2013)以波特兰为案例指出,虽然规划、政策积极推动着中心城区的城市更新,但零售业、餐饮业等仍快速向郊区蔓延,并出现分散化集聚特征。卡迪夫、乌得勒支、首尔、上海等欧亚城市也存在类似现象(Wang et al, 2005; Weltevreden et al, 2005; Guy, 2010; Kim et al, 2014)。此外,郊区购物中心、大卖场等商业综合体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对于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格局构建具有显著影响。Jones等(2000)、Walmsley(2006)基于多伦多与悉尼的分析指出,商业综合体的建成能大幅提升所在区域的商业氛围,并引发餐饮、零售机构在其周边迅速集聚。Teller(2008)则认为,传统商业街的衰落和郊区商业综合体的兴起在欧洲主要城市同步发生,由此形成以商业活动为核心的再郊区化。

2.2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引导下的空间经济现象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集聚溢出效应明显。首先,对机场引导下的空间经济现象进行综述。随着全球化、网络化的到来,集办公、娱乐与生活为一体的机场经济体正逐渐形成(Breure et al, 2003; McNeill, 2009)。Kasarda等(2011)认为,机场周边正在形成新的集聚经济区域,不同类型的进驻使这种经济体呈现运营独立性、业态多元化特征。Appold等(2013)、Cidell(2015)则指出,美国25个主要机场经济体在1996-2009年间的就业密度增速明显高于城市内部的大多数区域,特别是在1996-2002年间达到CBD的2倍,其中4个经济体已取代对应城市CBD的位置,5个则成为仅次于CBD的经济活动中心。其次,轨道交通建设作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热点,在国外学界同样受到关注。如Hensher等(2012)对悉尼串联中心城区与郊区的轨道交通沿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密度在站点周边持续增高。Meijia-Dorantes等(2012)在马德里的研究中指出,近郊新地铁线路诱发了不同类型的集聚,并将其定义为马德里地铁的规模经济现象。Beyazit(2015)则认为,伊斯坦布尔地铁的建设推动了地铁沿线的工业用地置换,众多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迁移至此。

3 区位选择偏好

区位选择偏好研究多从微观博弈视角出发,对

服务业企业在大城市内部的选址规律进行总结,具体包含以下两部分内容:一是区位选择的集聚区域偏好。追求利益最大化、自身满意化的共同目的促使不同规模、类型的服务业偏好分布区域各异,这一现象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二是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偏好。交通网络作为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与流通廊道,对城市的合理运转起到支配作用。随着复杂科学引入城市与区域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开始探讨交通网络的分形特征,并对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偏好开展研究。

3.1 区位选择的集聚区域偏好

3.1.1 生产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中,国外文献大多认为企业层级对其区位选择偏好起到决定性作用。Shearmur等(2002)将巴黎的金融业企业分为3类:总部经济型企业高度集聚在CBD,分支机构倾向分布在CBD及次中心,便民型机构则出现分散化分布的特征。Leslie(2007)对菲尼克斯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集聚程度差别较大,会计、律所、金融业与信息技术这4类行业的集聚程度最高,其中大型企业偏好在CBD集聚,以享有规模经济;而中小型企业则偏好分布在郊区,以满足居民日常需求。Watkins(2014)发现墨尔本也存在类似现象,高层级企业更加偏好分布在CBD及周边,而相关分支机构则呈现分散化、郊区化特征。

作为知识高度集中与扩散的显性载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区位选择偏好成为研究重点,然而结果却大相径庭。米兰、巴黎、多伦多、温哥华等城市的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偏好分布在郊区及卫星城,由此带动了高精尖、专门化次中心的形成(Airoidi et al, 1997; Shearmur et al, 2007; Halbert, 2012);而Storper等(2006)、Birch(2009)、Méndez等(2011)则指出,这类企业仍偏好分布在CBD及邻近次中心,它们所创造的知识创新环境也是重塑城市中心区活力的关键。同时,部分学者认为上述两种现象同时存在。例如:Muñiz等(2010)、Shearmur(2012)指出,巴塞罗那与蒙特利尔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仅高度集聚在郊区的科技城,在传统CBD的企业密度也要高于其他行业。Wei等(2015)则对上海市软件行业进行分析,认为外资企业具有显著的中心城区偏好特征,而内资企业则出现向外扩散机制且偏好郊区科技园集聚。

3.1.2 生活性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研究中,诸多学者发现即便是某

一特定行业,其内部企业由于服务水平、针对人群等要素的差异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集聚区域偏好。Prayag等(2012)指出,新西兰汉密尔顿的新增餐饮业由偏好CBD集聚逐渐向偏好郊区集聚转变,其中泰式、印度式餐馆毗邻移民社区分布,郊区化特征显著。Rogerson(2012)以南非开普敦、德班及伊丽莎白港的酒店行业为研究对象,发现除一星级酒店趋于分散分布外,其他星级酒店均偏好分布在滨海旅游区与CBD。Wang等(2014)则对长春市零售业进行分析,认为专卖店与零售商店倾向向集聚分布以获取居民的一站式购物需求,超市、商业综合体及家具城则倾向分散分布以避免竞争,其中商业综合体与专卖店更偏好毗邻CBD分布。

与此同时,“食物沙漠”^①现象在2000年之后受到学界重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超市、杂货店、快餐店等机构的区位偏好分异。Block等2004和Block等(2006)对新奥尔良、芝加哥的研究表明,黑人社区的超市数量明显少于白人社区,然而快餐店数量却是白人社区的6倍。Kwate等(2009)以纽约为案例地,同样认为快餐店的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黑人社区偏好,并指出这与社区的整体收入水平并不相关。Choi等(2013)则指出,东京的“食物沙漠”倾向在老年人、失业者及无车家庭等低收入人群集聚的区域出现。这种经济活动的区位偏好分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超重、肥胖等健康问题的产生,也加剧了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异。

3.2 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偏好

交通网络偏好的相关文献论证了良好的通达能力对于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性,且主要集中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首先,诸多学者基于空间句法视角,对交通网络偏好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Hillier等以伦敦国王十字街与金融城为例,指出零售业更偏好在可达性^②高的街巷两侧分布,并认为具有显著空间优势的街巷承载了大多数经济活动(Hillier, 1996; Hillier et al, 1993; Hillier et al, 2012)。van Nes(2005)、Scoppa等(2015)通过对阿姆斯特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研究证实,商业活动显著集聚在连接性^③高的街巷两侧。Chiaradia等(2012)则指出伦敦

主要商业中心所在街巷的可达性与通勤性^④均明显高于周边区域,并认为通勤性高的交通网络更易诱发大型商业网点的集聚。同时,Crucitti等(2006)提出的多中心网络评价模型也广泛应用于服务业的交通网络偏好研究。例如,Porta等(2009, 2012)指出博洛尼亚的商业活动偏好集聚在高可达性区域;并进一步将研究聚焦于生产性服务业,发现巴塞罗那的金融、房地产及信息技术行业企业偏好集聚在兼顾高可达性与通勤性的区域,而生活性服务业更偏好集聚在高可达性区域,这种微妙的差异也彰显了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偏好差异。Wang等(2014)则以长春为研究对象,认为不同零售业的交通网络偏好各异,专卖店偏好可达性高的街巷分布,超市、百货商店偏好通勤性高的街巷分布。

4 主要影响因素

大城市内部服务业的区位是多种动因交织的产物。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献阅读,本文总结了7个主要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归纳为共同主导因素、生产性服务业主导因素及生活性服务业主导因素进行述评。

4.1 共同主导因素

(1) 集聚效应。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集聚不仅可以使企业享有规模经济(Coffey et al, 2002; Berkosz et al, 2008; Muñiz et al, 2010),还使其共享劳动力市场以及基础设施服务(Hermelin, 2007)。Cook等(2007)、Huber(2012)、Watkins(2014)则指出,集聚也能为就业人员提供正式与非正式的知识交流与创新平台,从而加强企业间联系与协作,这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区位选择的关键。对于生活性服务业而言,Wrigley等(2002)、Teller(2008)、Wang等(2014)认为,不同类型企业的集聚能为消费者带来多样化的购物选择,且降低消费选择成本。hUallacháin等(2013)则基于菲尼克斯零售业区位选择的研究提出比较购物理论,即为不同商业网点混合布局所产生的效应差异显著,而合理高效的业态搭配

①食物沙漠:缺乏健康、新鲜食物供应的社区(Shaw, 2006; Walker et al, 2010),也有学者按照数量指标将其定义为:拥有少于10个商店且核心商店从业人员不超过20人的社区(Hendrickson et al, 2006)。

②可达性:特定街巷距离其他所有街巷的远近程度。

③连接性:特定街巷直接连接街巷的数量。

④通勤性:特定街巷被其他任意两条街巷间最短路径穿过的频率。

是促使集聚产生的动因之一。综上所述,集聚对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均有着强向心力,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进驻,巩固并扩大集聚规模,进而形成累积因果循环。

(2) 地方政策。税收补贴、环境法规及财政激励等针对个体的政策,对于服务业的区位影响是学者共同关注的(Gius et al, 2002; Luger et al, 2005; Condliffe et al, 2009; Sevtsuk, 2014)。同时,宏观调控政策对于城市经济结构的影响也显而易见。Muñiz等(2010)、Romero等(2014)指出地方政策推动了高新技术企业的郊区化与科技城化。Pan等(2015)则指出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强有力的城市规划与治理构建新的总部经济中心区,在短期内改变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与此同时,Weltevreden等(2005)、Prayag等(2012)、Lee等(2012)均认为合理高效的地方政策能够维持CBD的商业活力,从而抑制生活性服务业的离心化,如相对低廉的租金与停车费、旗舰店的强制性保留、鼓励娱乐活动进驻等。

(3) 社会分异。Leyshon等(1994, 1995)、Pollard(1996)开创性地将“金融排除”现象地理空间化,指出在经济萧条过程中,低收入地区的金融分支机构关闭几率更高。随后,更多的社会因素被学者论证为金融排除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种族(Kempson et al, 1999)、雇佣状态(Devlin, 2005)、收入(Sharkey et al, 2009; Appleyard, 2013)等。同时,这些因素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区位也构成显著影响,在上文探讨的“食物沙漠”部分已有涉及。简而言之,超市、食品商店等提供健康、新鲜食物的机构更易集中在中高收入、低移民比率的白人社区;快餐店、小型零售店等提供高热量、储藏食物的机构则多分布在低收入、高移民比率的有色人种社区(Lewis et al, 2005; Giang et al, 2008)。

4.2 生产性服务业主导因素

(1) 面对面对触。面对面对触不仅能够提供视觉、言语的交流,还可促进交流双方态度、能力与经验的相互认知。这种多维度的交流模式既可甄别企业与客户间合作的可行性与可靠性,又能促进企业之间的相互激励(Storper et al, 2004)。此外,“事前定价”、“事后检验”的行业特性导致机会主义与道德风险易在企业合作与交易中产生,面对面对触对于在关键时期建立相互信任至关重要(Boiteux-Orain et al, 2004; Sokol et al, 2008)。再者,面对面对触有利于企业通过正式、非正式的交流融入本地

市场网络,了解并筛选合作与交易对象(Storper, 2013)。上述原因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前台企业倾向集聚在面对面接触机会更高的CBD和次中心。

(2) 人居环境适宜度。犯罪率的高低、公共服务质量的优劣以及绿色空间的可获取性等人居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的影响也是学者探讨的内容。Love等(1999)、Elgar等(2010)认为良好的人居环境能够提升企业从业人员的工作满意度,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区位,特别是对于小微企业的影响更大。Gong等(2012)对曼哈顿上、中、下城的79个金融业企业在“911”后是否出现迁移、回流等现象进行分析,并对企业CEO及从业人员进行深入访谈,结果表明是否存在恐怖主义的威胁已成为该地区金融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Kimmelberg等(2013)通过对美国房地产协会会员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指出人居环境适宜度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要远大于生活性服务业及制造业,主要原因在于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企业从业人员更加注重生活质量。Weterings(2014)则重点探讨企业的区位迁移,如果个体企业周边存在数量众多的高质量零售商铺、咖啡馆及餐厅,那么其迁移的几率较小,这是由生活质量需求与面对面对触需求所共同决定的。

4.3 生活性服务业主导因素

(1) 交通网络中心性。上文已详细阐述了生活性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偏好。Hillier(1999)将交通网络的一系列属性统称为中心性(Live Centrality),并认为城市内部的不同街巷因其中心性的差异而承载不同规模的人、车流运动,进而深刻影响着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2000年以来,不同学者对生活性服务业的中心性影响机制进行大量分析认为,连接性(van Nes, 2005; Sheng, 2011; Scoppa et al, 2015)、可达性(Ortiz-Chao et al, 2007; Tsou et al, 2013)与通勤性(Porta et al, 2009; Sevtsuk, 2010, 2014)等属性在不同城市是影响区位选择的核心要素。考虑到不同中心性的算法与表征意义大相径庭,这种差异性的研究结论尚未得到权威解释,有可能与不同城市的交通网络结构以及居民出行目的、效率和方式有关。总而言之,中心性与生活性服务业的区位息息相关,这也是未来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领域。

(2) 职住人口分布。顾名思义,生活性服务业主要服务于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与职住人口分布

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关注。Walmsley(2006)认为零售业数量的快速增长与对应地区居民数量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代表了居民的诉求。Hansen等(2010)、Dong(2013)则指出,商业活动的空间分布模式主要受就业人口分布的影响,且在就业次中心周边出现集聚。可以说,由于提供产品的均质性与必需性,无论是传统的百货商店、餐馆还是新兴的商业综合体,“就近服务”是大部分消费者的选择特征,并决定了职住人口分布对于生活性服务业区位的重要作用。

5 研究总结与启示

5.1 研究总结

综上所述,大城市内部服务业的区位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不同领域的学者从空间分布格局、区位选择偏好、主要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并具有如下特点:①集聚与扩散的解读是区位研究的核心。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在大城市内部持续向CBD集聚已成为学者的共识,其空间分布格局则呈现多中心或单中心模式,且在同一大洲的城市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相比之下,生活性服务业的郊区扩散现象明显,并依托社区及商业综合体等因素在郊区出现集聚中心,而大多数城市CBD的企业数量与营业额则出现大幅下降。此外,不同规模、类型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区位选择偏好具有明显差异。②交通要素在集聚与扩散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机场、轨道交通站点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能迅速诱发服务业的集聚与迁移,这得益于交通基础设施对周边区域发展的溢出效应和提升可达性、降低交通成本的能力。同时,交通网络作为服务业的微观载体,其自身的中心性也能引发企业自下而上的线性集聚与扩散。③研究视角趋向微观化。随着数据可获得性的增强,基于企业个体数据的研究逐渐增多,有效地突破了区块统计单元束缚,可识别服务业在不同尺度的集聚与扩散特征。④强调非经济要素对区位的影响。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制度、文化及演化转向对大城市内部服务业区位研究的影响深远,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服务经济活动置于现实中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中进行解读,并将人居环境适宜度、地方政策等非经济要素视为影响服务业区位选择偏好与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变量。⑤关注社会公平。随着金融

危机、贫富极化等社会经济问题的相继出现,西方发达国家学者开始关注社会公平,继而展开了食物沙漠、金融排除等研究,指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服务分配确实存在明显分异,从服务经济的视角理解大城市内部的区域经济不平衡与社会分异现象。

5.2 对中国服务业区位研究与实践的启示

5.2.1 加强基于企业个体数据的演化规律探讨

随着开放数据环境的日趋成熟,中国大城市内部服务业区位的演化规律研究开始兴起,但多基于街道行政区、邮政编码区等空间统计单元的汇总数据,通常会掩盖企业的某些微观动态信息(史进等, 2014)。因此,本文建议加强基于企业个体数据的演化规律探讨,通过对集聚与扩散的具体范围、就业人数变化等指标性内容的动态聚类分析,识别企业个体或群体的进入、退出与迁移等动态演化过程,解读服务经济格局的变迁以及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的区位偏好差异。

5.2.2 地理空间分析的社会经济转向

国内相关研究更加注重地理空间层面的研究,对社会经济要素存在一定忽视。因此,本文认为应促进地理空间分析的社会经济转向。首先,建议研究立足于社会经济分异。随着城市二元结构增强、老城区边缘化等问题在国内大城市趋向常态,生产生活服务的非均等化现象越发明显,因而有必要针对性地将社会经济分异投射到地理空间中,并进行相关行业的区位研究。其次,建议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理解社会经济要素对于区位的影响。国内文献对于服务业区位的影响因素多为客观描述,也有学者运用计量模型衡量商圈等级、是否有科技园等地理空间变量的作用(毕秀晶等, 2011; 王士君等, 2015),然而上述两种方法对于面对面接触、企业氛围等社会经济要素的影响缺乏有效解释,因而有必要在研究中强化“人”的作用,应用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与结构性访谈等方法深入理解不同社会经济要素对于服务业区位决策的影响。

5.2.3 有机嵌入城市规划与管理体制

存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已成为现阶段中国大城市良性发展的着眼点。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核心功能,服务业的合理规划无疑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因此,本文建议将服务业区位研究有机嵌入城市规划与管理体制(图1)。主要包括:①构建服务业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包括全面识别大城市内部企业个体的性质、营业额与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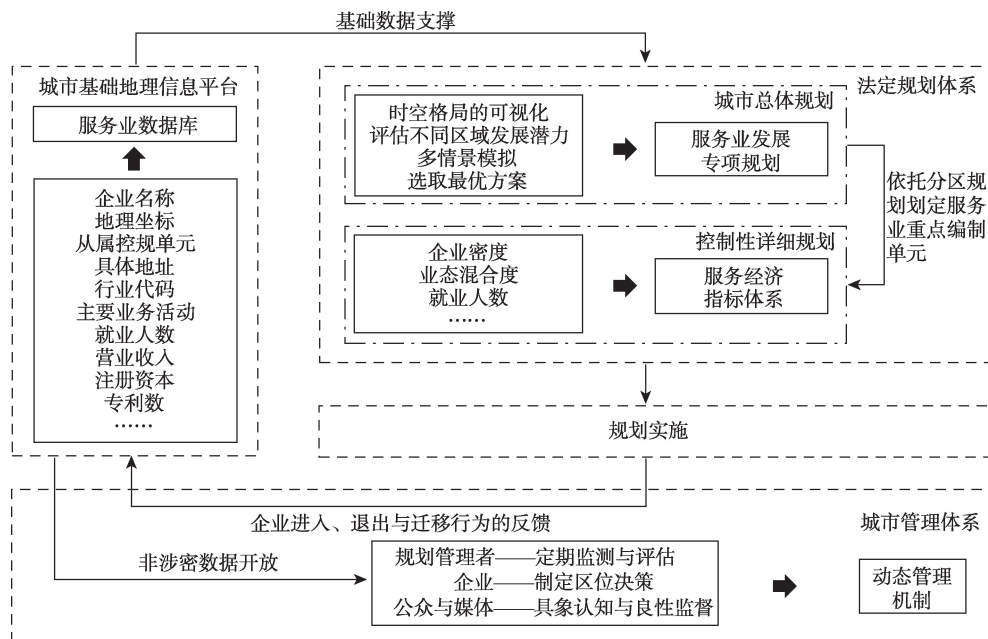


图1 嵌入策略

Fig.1 Embedding strategy

人数等属性,为各层级规划提供数据支撑。②将服务业区位研究嵌入法定规划体系。其中,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增加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的相关章节。对服务业的时空格局进行可视化分析,并评估城市内部不同区域的发展潜力,进而展开服务业集聚与扩散过程的多情景模拟与方案选优,确保土地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和不同行业的理性集聚。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构建服务经济指标体系。选取上层次规划确定的服务业重点编制单元,增加企业密度、业态混合度、区位熵等引导性控制要素,量化不同区域服务业的发展目标。③构建动态的管理机制。将企业的进入、迁移与退出行为实时反馈至数据库,并将数据库中的非涉密内容向社会全面开放。不仅便于规划管理者的定期监测与评估,也可使企业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符合自身的区位决策,还有助于公众与媒体更加全面的认知城市,从而推动规划实施过程中的良性监督。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毕秀晶,汪明峰,李健,等. 2011. 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空间集聚与郊区化[J]. 地理学报, 66(12): 1682-1694. [Bi X J, Wang M F, Li J, et al. 2011. Agglomeration and suburbanization: A study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ftware industry and its evolution in metropolitan Shanghai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6(12): 1682-1694.]
- 陆大道. 1995. 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M]. 北京: 科学出版

- 社. [Lu D D. 1995. Quyu fazhan jiqi kongjian jiegou[M].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 申玉铭,柳坤,邱灵. 2015. 中国城市群核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基本特征[J]. 地理科学进展, 34(8): 957-965. [Shen Y M, Liu K, Qiu L. 2015. Characteristics of services development of core citi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China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4(8): 957-965.]
- 申玉铭,吴康,任旺兵. 2009. 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研究进展[J]. 地理研究, 28(6): 1494-1507. [Shen Y M, Wu K, Ren W B. 2009.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n producer service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8(6): 1494-1507.]
- 石忆邵,刘玉钢,尹昌应,等. 2012. 国内外大都市服务业用地发展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Shi Y S, Liu Y G, Yin C Y, et al. 2012. Guoneiwai dadushi fuwuyeyongdi fazhan yanjiu[M]. Beijing, China: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 史进,贺灿飞. 2014. 企业空间动态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33(10): 1342-1353. [Shi J, He C F. 2014. Research progress in spatial dynamics of firm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3(10): 1342-1353.]
- 王士君,浩飞龙,姜丽丽. 2015. 长春市大型商业网点的区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70(6): 893-905. [Wang S J, Hao F L, Jiang L L. 2015. Location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of large-scale commercial sites in Changchu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6): 893-905.]
- Airoldi A, Janetti G B, Gambardella A, et al. 1997. The impact of urban structure on the loc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7(1): 91-114.

- Appleyard L. 2013. The geographies of access to enterprise finance: The case of the West Midlands, UK[J]. *Regional Studies*, 47(6): 868-879.
- Appold S J, Kasarda J D. 2013. The airport city phenomenon: Evidence from large US airports[J]. *Urban Studies*, 50(6): 1239-1259.
- Arauzo-Carod J M. 2015. Agglomeration vs. dispers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districts of Paris[R]. Tarragona, Spain: Universitat Rovira i Virgil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Berkoz L, Turk S S. 2008. Determination of location-specific factors at the intra-metropolitan level: Istanbul case[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9(1): 94-114.
- Beyazit E. 2015. Are wider economic impacts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s always beneficial: Impacts of the Istanbul Metro on the generation of spatio-economic inequalities [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45: 12-23.
- Birch E L. 2009. Downtown in the "New American City" [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26(1): 134-153.
- Block D, Kouba J. 2006. A comparison of the availability and affordability of a market basket in two communities in the Chicago area[J].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9(7): 837-845.
- Block J P, Scribner R A, DeSalvo K B. 2004. Fast food, race/ethnicity, and income: A geographic analysis[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7(3): 211-217.
- Boiteux-Orain C, Guillain R. 2004. Changes in the intrametropolitan loc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Île-de-France (1978-1997): Do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promote a more dispersed spatial pattern[J]. *Urban Geography*, 25(6): 550-578.
- Breure A, van Meel J. 2003. Airport offices: Facilitating nomadic workers[J]. *Facilities*, 21(7-8): 175-179.
- Chiaradia A, Hillier B, Schwander C, et al. 2012. Compositional and urban form effects on centres in Greater London [J]. *Proceedings of the ICE-Urban Design and Planning*, 165(1): 21-42.
- Choi Y, Suzuki T. 2013. Food deserts, activity patterns, & social exclusion: The case of Tokyo, Japan[J]. *Applied Geography*, 43: 87-98.
- Cidell J. 2015. The role of major infrastructure in sub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study of airports and cit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5(6): 1125-1144.
- Coffey W, Shearmur R. 2002.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of high-order service employment in the Montreal metropolitan region, 1981-96[J]. *Urban Studies*, 39(3): 359-378.
- Condliffe S, Morgan O A. 2009. The effects of air quality regulations on the location decisions of pollution-intensive manufacturing plants[J].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36(1): 83-93.
- Cook G A S, Pandit N R, Beaverstock J V, et al. 2007. The role of location in knowledge creation and diffusion: Evidence of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forces in the City of London financial services agglomeration[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9(6): 1325-1345.
- Crucitti P, Latora V, Porta S. 2006. Centrality measures in spatial networks of urban streets[J]. *Physical Review E*, 73(3 Pt 2): 036125.
- Devlin J F. 2005. A detailed study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 the UK[J].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28(1): 75-108.
- Dong H W. 2013. Concentration or dispersion? Location choice of commercial developers in the Portland metropolitan area, 2000-2007[J]. *Urban Geography*, 34(7): 989-1010.
- Drennan M P, Kelly H F. 2011. Measuring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with office rent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1(3): 481-507.
- Elgar I, Miller E J. 2010. How office firms conduct their location search process: An analysis of a survey from the Greater Toronto area[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33(1): 60-85.
- Fernández-Maldonado A M, Romein A, Verkoren O, et al. 2014. Polycentric structures in Latin American metropolitan areas: Identifying employment sub-centres[J]. *Regional Studies*, 48(12): 1954-1971.
- Freestone R, Murphy P. 1998. Metropolitan restructuring and suburban employment centers: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64(3): 286-297.
- Giang T, Karpyn A, Laurison H B, et al. 2008. Closing the grocery gap in underserved communities: The creation of the Pennsylvania Fresh Food Financing Initiative[J].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14(3): 272-279.
- Gius M P, Frese P. 2002. The impact of state personal and corporate tax rates on firm location[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9(1): 47-49.
- Gong H M, Kevin K. 2012. The impact of 9/11 on the geography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New York: A few years later [J].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4(3): 370-388.
- Guy C. 2010. Development pressure and retail planning: A study of 20-year change in Cardiff, UK[J].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tail, Distribution and Consumer Research*, 20(1): 119-133.
- Halbert L. 2012. Collaborative and collective: Reflexive co-or-

- din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open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industry clusters of the Paris region[J]. *Urban Studies*, 49(11): 2357-2376.
- Han S S, Qin B. 2009.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Shanghai[J]. *Urban Studies*, 46(4): 877-896.
- Hansen H K, Winther L. 2010. The spatial division of talent in city regions: Location dynamics of business services in Copenhagen[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01(1): 55-72.
- Hendrickson D, Smith C, Eikenberry N. 2006. Fruit and vegetable access in four low-income food deserts communities in Minnesota[J].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3(3): 371-383.
- Hensher D A, Truong T P, Mulley C, et al. 2012. Assessing the wider economy impacts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with an illustrative application to the North-West Rail Link project in Sydney, Australia[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4: 292-305.
- Hermelin B. 2007. The urbanization and suburbanization of the service economy: Producer services and specialization in Stockholm[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89(S1): 59-74.
- Hillier B. 1996. *Space is the machine: A configurational theory of architecture*[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illier B. 1999. Centrality as a process: Accounting for attraction inequalities in deformed grids[J]. *Urban Design International*, 4(3-4): 107-127.
- Hillier B, Penn A, Hanson J, et al. 1993. Natural movement: Or, configuration and attraction in urban pedestrian movement[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1): 29-66.
- Hillier B, Yang T, Turner A. 2012. Normalising least angle choice in Depthmap: And how it opens up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lobal and local analysis of city space[J]. *Journal of Space Syntax*, 3(2): 155-193.
- hUallacháin B Ó, Leslie T F. 2007.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urban core and suburbs of Phoenix, Arizona[J]. *Urban Studies*, 44(8): 1581-1601.
- hUallacháin B Ó, Leslie T F. 2013. Spatial pattern and order in sunbelt retailing: Shopping in Phoenix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5(3): 396-420.
- Huber F. 2012. On the sociospatial dynamics of personal knowledge networks: Formation, maintenance, and knowledge interaction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4(2): 356-376.
- Jansson J O. 2013. *The economics of services: Micro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nd policy*[M].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Jones K, Doucet M. 2000. Big-box retailing and the urban retail structure: The case of the Toronto area[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7(4): 233-247.
- Kasarda J D, Lindsay G. 2011. *Aerotropolis: The way we'll live next*[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Kempson E, Whyte C. 1999. *Kept out or opted out: Understanding and combating financial exclusion*[M]. London, UK: Bristol UK Policy Press.
- Kim J I, Yeo C H, Kwon J-H. 2014. Spatial change in urban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in Seoul metropolitan city: Clustering, dispersion and general disper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Sciences*, 18(3): 355-372.
- Kimelberg S M, Williams E. 2013. Evaluating the importance of business location factors: The influence of facility type [J]. *Growth and Change*, 44(1): 92-117.
- Kwate N O A, Yau C-Y, Loh J-M, et al. 2009. Inequality in obesogenic environments: Fast food density in New York City[J]. *Health & Place*, 15(1): 364-373.
- Lee S, Seo J G, Webster C. 2006. The decentralising metropolis: Economic diversity and commuting in the US suburbs [J]. *Urban Studies*, 43(13): 2525-2549.
- Lee Y, McCracken M. 2012.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movement: Shopping centres in Denver, USA, and Brisbane, Australia[J]. *Urban Studies*, 49(7): 1489-1506.
- Leslie T F. 2010. Identifi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centers in Phoenix through a multi-criteria kernel-density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33(2): 205-235.
- Leslie T F, hUallacháin B Ó. 2006. Polycentric Phoenix[J]. *Economic Geography*, 82(2): 167-192.
- Lewis L B, Sloane D C, Nascimento L M, et al. 2005. African Americans' access to healthy food options in South Los Angeles restaurants[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5(4): 668-673.
- Leyshon A, Thrift N. 1994.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and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withdrawal: Problems and policies [J]. *Area*, 26(3): 268-275.
- Leyshon A, Thrift N. 1995. Geographie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Financial abandonment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3): 312-341.
- Love L L, Crompton J L. 1999. The role of quality of life in business (Re)location decis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44(3): 211-222.
- Luger M I, Bae S. 2005. The effectiveness of state business tax incentive programs: The case of North Carol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19(4): 327-345.
- McNeill D. 2009. The airport hotel as business space[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91(3):

- 219-228.
- Mejia-Dorantes L, Paez A, Vassallo J M. 2012.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mpacts on firm location: The effect of a new metro line in the suburbs of Madrid[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2: 236-250.
- Méndez R, Moral S S. 2011. Spanish citie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18(2): 136-155.
- Muñiz I, Garcia-López M À. 2010. The polycentric knowledge economy in Barcelona[J]. *Urban Geography*, 31(6): 774-799.
- Ortiz-Chao C, Hillier B. 2007. In search of patterns of Land-use in Mexico City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t the plot level[C]//Kubat A S, Ertekin O, Guney Y I, et al.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space syntax symposium*. Istanbul, Turkey: Istanbul Technical University.
- Pan F H, Guo J, Zhang H, et al. 2015. Building a “Headquarters Economy”: The geography of headquarters within Beij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rban restructuring[J]. *Cities*, 42: 1-12.
- Pollard J S. 1996. Banking at the margins: A geography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 Los Angel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8(7): 1209-1232.
- Porta S, Latora V, Wang F, et al. 2009. Street centrality and densities of retail and services in Bologna, Ital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36(3): 450-465.
- Porta S, Latora V, Wang F, et al. 2012. Street centrality and th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Barcelona[J]. *Urban Studies*, 49(7): 1471-1488.
- Prayag G, Landré M, Ryan C. 2012. Restaurant location in Hamilton, New Zealand: Clustering patterns from 1996 to 2008[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4(3): 430-450.
- Robertson K A. 1983. Downtown retail activity in large American cities 1954- 1977[J]. *Geographical Review*, 73(3): 314-323.
- Rogerson J M. 2012. The changing location of hotels in South Africa's coastal cities, 1990-2010[J]. *Urban Forum*, 23 (1): 73-91.
- Romero V, Solís E, De Ureña J M. 2014. Beyond the metropolis: New employment centers and historic administrative cities in the Madrid global city region[J]. *Urban Geography*, 35(6): 889-915.
- Sassen S. 200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M]. 2nd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oppa M D, Peponis J. 2015. Distributed attraction: The effects of street network connectivity upon the distribution of retail frontage in the City of Buenos Air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42(2): 354-378.
- Sevtsuk A. 2010. Path and place: A study of urban geometry and retail activity in Cambridge and Somerville, MA[D].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Sevtsuk A. 2014. Location and agglomer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retail and food businesses in dense urban environments[J].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34 (4): 374-393.
- Sharkey J R, Horel S, Han D, et al. 2009. Association between neighborhood need and spatial access to food stores and fast food restaurants in neighborhoods of Colonia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Geographics*, 8(5): 880-898.
- Shaw H J. 2006. Food deserts: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a classification[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88(2): 231-247.
- Shearmur R. 2012. The geography of intrametropolitan KIBS innovation: Distinguishing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from innovation dynamics[J]. *Urban Studies*, 49(11): 2331-2356.
- Shearmur R, Alvergne C. 2002. Intrametropolitan patterns of high-order business service lo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venteen sectors in Ile-de-France[J]. *Urban Studies*, 39(7): 1143-1163.
- Shearmur R, Coffey W, Dube C, et al. 2007. Intrametropolitan employment structure: Polycentricity, scatteration, dispersal and chaos in Toronto, Montreal and Vancouver, 1996-2001[J]. *Urban Studies*, 44(9): 1713-1738.
- Sheng Q. 2011. Changing centralities under urban configurational ‘scale-structure’: Pondering the spatial conditions for market and retail areas in Beijing[D]. Delft, Netherlands: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Sokol M, Van Egeraat C, Williams B. 2008. Revisiting the ‘informational city’: Space of flows, polycentricity and the geography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in the emerging global city-region of Dublin[J]. *Regional Studies*, 42(8): 1133-1146.
- Storper M. 2013. *Keys to the city: How economics, institution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olitics shape development*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orper M, Manville M. 2006. Behaviour, preferences and cities: urban theory and urban resurgence[J]. *Urban Studies*, 43(8): 1247-1274.
- Storper M, Venables A J. 2004. Buzz: Face-to-face contact and the urban econom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4 (4): 351-370.
- Suárez M, Delgado J. 2009. Is Mexico City polycentric? A trip attraction capacity approach[J]. *Urban Studies*, 46(10): 2187-2211.
- Teller C. 2008. Shopping streets versus shopping malls-deter-

- minants of agglomeration format attractiveness from the consumers' point of view[J].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tail, Distribution and Consumer Research*, 18(4): 381-403.
- Trendle B. 2003. Changes in industrial and spatial concentration in Queensland's regional labour markets, 1986-2001 [R]. Brisbane, 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 Tsou K-W, Cheng H-T. 2013. The effect of multiple urban network structures on retail patterns: A case study in Taipei, Taiwan[J]. *Cities*, 32: 13-23.
- van Nes A. 2005. Typology of shopping areas in Amsterdam [C]//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space syntax symposium. Delft, Netherlands: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Walker R E, Keane C R, Burke J G. 2010. Disparities and access to healthy food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view of food deserts literature[J]. *Health & Place*, 16(5): 876-884.
- Walmsley D J. 2006. Retail change in Southern Sydney: Lifestyle-linked restructuring[J].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24(4): 509-523.
- Wang F H, Chen C, Xiu C L, et al. 2014. Location analysis of retail stores in Changchun, China: A street centrality perspective[J]. *Cities*, 41: 54-63.
- Wang S G, Zhang Y C. 2005. The new retail economy of Shanghai[J]. *Growth and Change*, 36(1): 41-73.
- Wassmer R. 2002. Fiscalisation of land use,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and non-central retail sprawl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J]. *Urban Studies*, 39(8): 1307-1327.
- Watkins A R. 2009. The dynamics of urban economies: Melbourne 1971 to 2006[J]. *Urban Studies*, 46(8): 1553-1576.
- Watkins A R. 201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Melbourne, 1971-2006[J]. *Urban Geography*, 35(7): 1041-1065.
- Wei Y D, Bi X J, Wang M F, et al. 2016. Globalizatio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locational trajectories of software firms in Shanghai[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8(2): 211-226.
- Weltevreden J, Atzema O, Frenken K. 2005. Evolution in city centre retailing: The case of Utrecht (1974-2003)[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33(11): 824-841.
- Weterings A. 2014. What makes firms leave the neighbourhood [J]. *Urban Studies*, 51(8): 1613-1633.
- Wrigley N, Lowe M. 2002. Reading retail: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on retailing and consumption spaces[M]. London, UK: Routledge.
- Yi H, Yang F F, Yeh A G O. 2011. Intraurban loc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Guangzhou,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3(1): 28-47.

Progress of services location studies in metropolis

ZHOU Lin, SHEN Tiyan*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services economy, services are becoming the core driving forces of metropolis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Location choice of services is also the main factor that shapes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n metropoli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progress of services location research in metropolis from three aspects: spatial pattern, location preference, and main influence factor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Discussion of services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is often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 (2) Transportation factor is of high importance in the process of services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3)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tends to be microscopic. (4) The influence of non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urban amenity and local policy are being taken seriously. (5) Some researchers have focused on social equity and worked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ervices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Finally, this article recommends further research on change analysis based on data of individual service companies, refocusing geospatial research on socioeconomic issues, and embedding services research into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 metropolis; location of services; research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literature